

长沙重大考古发现

长沙市文物局 编



长沙重大考古发现

长沙市文物局 编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岳麓書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沙重大考古发现/长沙市文物局编.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1

ISBN 978-7-5538-0077-6

I. ①长... II. ①长... III. ①考古发现—长沙市

IV. ①K872. 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7024 号

CHANGSHA ZHONGDA KAOGU FAXIAN

长沙重大考古发现

作 者: 长沙市文物局

责任编辑: 管巧灵 王文西

责任校对: 舒 舍

整体设计: 刘 峰 刘 涓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 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 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 <http://ylbooks.taobao.com>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23.25

字数: 430 千字

印数: 1—2,600

ISBN 978-7-5538-0077-6/K · 340

定价: 380.00 元

承印: 长沙健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长沙重大考古发现》编撰委员会名单

主 编：夏建平

副 主 编：刘秋成 杨长江

编 委：聂 勇 曹 凇

杨晓刚 唐 彬

执行编辑：宋少华

编 辑（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立华 宋少华 何旭红

黄朴华 李鄂权 邱东联

统 筹：周慧雯

序言

夏建平

我对考古学是外行，但对历史常怀有敬畏之心，对历史文化遗产抱有景仰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举世瞩目。中国的考古学虽然是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之后的舶来品，但经历了几代学人近一个世纪的艰辛探索，终于奠定了中国考古辉煌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并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对话中继续开辟自己前行的道路。

据考古调查资料显示，长沙早在二十万年前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遗物，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给我们留下众多的文化遗迹。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勤奋耕耘、倾心研究，先人跋涉的足迹渐次清晰，历史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古代社会不为人知的场景正缓缓复原。

本书所展示的长沙几个历史阶段的考古发现，便是长沙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长河中凸显的几个重要节点。这些节点具有厚重的历史印记、鲜明的地域风格与承上启下的文化特质。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促进并形成了诸如商周方国青铜文化、汉代长沙国王陵、马王堆汉墓、三国吴简、唐代长沙窑等多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利用的文化热潮。当前，我市已建成或正在建设以宁乡炭河里遗址为中心的商周方国青铜文化保护研究区；以湘江西岸谷山为主体的汉代长沙王陵国家遗址公园；以长沙走马楼吴简为代表的古代简牍文化保护研究平台；以望城石渚唐代长沙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依托的古陶瓷保护研究区，全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我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还会有更令人惊奇的重要考古发现，并以之为基础，逐步构建长沙古代文化的时空框架，复原那些绚丽多彩、栩栩如生的历史社会，为长沙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古代物质遗存来研究过去社会的学科。“考古学既是对古代遗产的发现与细致的科学分析，同时还是富有创造性构想的工作……是对我们自己和已逝的、古代知识的求索”（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页)。人类以往经历的一切,既是考古学试图理解的对象,也是考古学赖以研究人类以往历史的基础。“从某种程度说,考古学家就是通过与考古资料的‘对话’来寻求人类过去的部分答案”(美国考古学家沃森语)。不仅如此,考古学的另一项任务是在追寻人类各个文明体系与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来源、发生、发展的轨迹,运行的机制与内在价值的同时,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合理等量的参照。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谈到中国主流社会文明演进的基本脉络时指出:“从已知重要文明阶段出发,上下求索,逻辑演绎,或能揣摩未知文明之大概……历史的研究,当然不能止于此等揣摩,应据科学的史料求其是,但明白了历史的基本脉络或历史的大势,则能为其相关的未知领域的探索较准确地提出课题,把握准方向,掌握好度。”(《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自序,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我们保护研究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为了寻求结论,更是面对未来时必须经历的一次心智的洗礼。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任何现在所谓“老”的东西都曾经“新”过,而任何现在“新”的东西都注定变“老”。我们从历史走来,现代是历史的继续,未来则是现代所作的取舍。因为历史而有现代,因为现代而有未来,人在这一过程中由此获得了培养自己独有的历史品性。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长沙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正朝着建设“国际文化名城”的战略目标迈进。传承城市文明、保护历史文化是我们现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共同携手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守护好独具历史品性的精神家园,迈向美好的未来。

谨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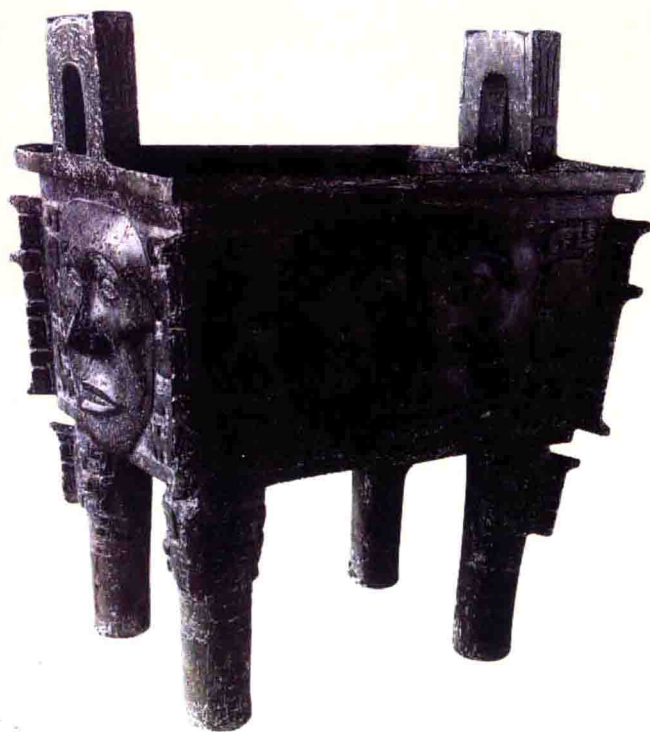
2013年元月

(作者系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目 录

001	第一章 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六十年
	(长沙市博物馆 邱东联)
047	第二章 长沙地区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何旭红)
049	一、长沙地区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发现与分布
077	二、长沙地区商西周时期与青铜器并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089	三、长沙地区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研究
097	第三章 西汉长沙国王陵发掘与研究
	(长沙简牍博物馆 李鄂权)
099	一、长沙国历史沿革
106	二、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
135	三、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嫪墓
150	四、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
162	五、望城风篷岭一号汉墓
182	六、几点讨论
191	第四章 马王堆汉墓
	(长沙市博物馆 王立华)
193	一、马王堆的传说

194	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
200	三、马王堆汉墓的葬制与棺槨
204	四、马王堆汉墓的主人与长沙国
207	五、轪侯夫人的不朽遗容
211	六、丰厚的随葬物品
248	七、经久不衰的热门课题
251	第五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与研究 (长沙简牍博物馆 宋少华)
253	一、序言
254	二、三国吴简的发现
261	三、三国吴简的考古发掘
268	四、三国吴简的形制特征与主要内容
308	五、三国吴简的书法特点
311	六、三国吴简的埋藏年代与古代档案的处理
312	七、尾语
321	第六章 唐代长沙窑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黄朴华)
323	一、遗址概述
332	二、文化特点
362	三、历史影响
366	后 记



第一章 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六十年

长沙市博物馆 邱东联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2 年被列入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胜众多，文物之丰富独冠三湘，驰名中外。

长沙位于东经 $111^{\circ}54' \sim 114^{\circ}15'$ ，北纬 $27^{\circ}51' \sim 28^{\circ}40'$ ，东西长约 233 公里，南北宽约 90 公里，总面积约 11819 平方公里，处于湘中丘陵与洞庭湖冲积平原过渡地带和湘浏盆地。其扼南北要冲，东屏罗霄毗江西，西障雪峰连云贵，南峙衡岳达广州，北托洞庭通武汉，素称“荆豫唇齿，黔粤咽喉”。长沙城区处于湘江和浏阳河交汇的河谷地带，以岳麓为屏，湘江为带，橘洲纵贯江心，浏阳河曲绕于北，城廓屹立其间。青山、碧水、绿洲和名城互为依托，浑然一体。湘浏盆地岗峦起伏，沟谷纵横，缓坡阶地，土沃水秀，为古代长沙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大自然造化了湘浏盆地，湘浏盆地孕育了古城长沙。山水相依，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为长沙城市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1]。

长沙地处内陆腹地，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冬寒夏热，四季分明，春秋短促，冬夏绵长；春末夏初多雨，夏末秋季干旱。长沙城区年平均气温 $16.8 \sim 17.2^{\circ}\text{C}$ ，全年无霜期约 275 天，年平均降水量约 1300 毫米^[2]。寒暑交替、四季分明的自然气候，影响着数千年来长沙历史文明的进程。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使长沙成为中原的前方，沿海的后方，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提升与发展。炎帝的传说，舜帝的史迹，殷人的南迁，楚人的经略。墨客骚人、名贤俊杰，往返于此，传下段段佳话，留下斑斑胜迹。

长沙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公元前 11 世纪周公营建雒邑竣工后，周成王大会诸侯，“长沙鳖”作为方物进贡周王室。据汉孔晁注《王会篇》云“长沙鳖特大而美，故贡也”，方物以地而名，可见长沙当时名气之大。此后《战国策·赵策》中有“长沙之难，太子横为质于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长沙，楚之粟也”，长沙地名已屡见不鲜。1986 年湖北荆门包山 2 号楚墓出土的楚简中有“长沙正”、“长沙公”之名。据《湘川记》载“秦分黔中郡以南之沙乡地区置长沙郡，则长沙之名始于洪荒之世，而以之为乡为郡，则在后世耳”。

目前学术界认为，古长沙为扬越之地，属三苗国。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封少昊于熊湘，熊湘即为长沙。炎帝教耕，“崩葬于长沙”。舜帝南巡，“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禹分九州，长沙属荆州。春秋中晚期长沙纳入楚国版图，战国时期已建有城邑，为楚南重镇。秦王扫六合，统一全国，在原七国行政区划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并设置三十六郡，长沙郡名列其中。从此长沙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治所存世，历代相传。

近代考古学在长沙出现较晚，但古代文物的出土和著录则可早到 20 世纪 20 年代

初期。1922年在沅水下游的桃源漆家河出土了一件有“皿天全”的商代方彝。1938年宁乡月山铺一农民在转耳仑山坡上发现了著名的“四羊方尊”。现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的两羊尊、日本住友铜器馆的虎食人卣，据传为新中国成立前分别出土于长沙县跳马涧和宁乡与安化县交界的沅水岸边。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长沙等地的古墓葬被大量盗掘，曾出土一批极为珍贵的楚汉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有1942年出土于长沙识字岭子弹库楚墓的缙书，出土于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以及瑟、竽、鼓等乐器、漆器、木俑、天平砝码、丝织品、琉璃器、铜镜和兵器，汉墓出土的有“杨主家”铭文的长沙王室漆器、铜器，柳家大山汉墓出土的“闵翁主釭”铜灯、“刺庙”铜牛灯。这一时期大批古墓葬惨遭破坏，而被盗取的文物则大量流失国外。1937年，商承祚先生来到长沙，将所见到的楚汉文物著录于《长沙古物闻见记》，并于1938年10月以木雕版于成都刊行。1941年，商先生再度入湘，并将第二次在长沙的见闻，包括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州句”错金铜剑、“越王嗣旨不光”铜剑、秦昭王二十九年宣太后漆樽等，逐日记录，重点叙述，但终未能发表。1942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将商承祚先生在长沙两次考察所得的文物，在成都举办了长沙古器物展览，所展示的漆木、丝织、玉石、铜铁等各种器物共七类220余件，系统地介绍了长沙地区的楚汉文物，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商承祚先生对长沙地区楚汉文物的考察与研究，可谓有开拓之功。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长沙乃至湖南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和研究^[3]。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沙地区的考古工作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获得新的突破。

六十年来长沙地区的考古工作，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6年。这个阶段长沙地区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中央和湖南省级文博单位配合长沙城市基本建设对古墓葬，特别是对楚汉墓葬进行发掘，同时对长沙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重点调查。通过发掘初步建立起长沙地区楚汉墓葬考古的年代学标尺，并试图通过实物资料研究楚汉时期的社会组织、经济文化，以阐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时期的长沙市文物工作者大多协助开展工作。

1951年，以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为队长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队在长沙近郊伍家岭、识字岭、五里牌等地发掘古墓葬162座，其中楚墓73座。从此，长沙地区乃至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进入了科学发掘的新时期。这次在长沙的发掘，所获资

料收录于1957年出版的《长沙发掘报告》^[4]中。报告对长沙地区的战国两汉墓葬进行了分期,阐明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为此后全面展开楚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1952年,中南文化部组织顾铁符、商承祚等先生以及兄弟省区的一些考古工作者继续在长沙近郊发掘古墓葬470余座。1953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清理工作队成立。1958年与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合并,仍以长沙作为考古发掘重点地区。长沙市建立自己的考古队伍,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始于1959年底至1960年初。1967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被撤销,考古发掘工作中断,其任务由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承担。至“文革”结束,长沙地区共清理发掘各时期古墓葬超过3000座,其中楚墓2000余座,包括浏城桥1号墓^[5]、左家公山15号墓、仰天湖25号墓^[6]、五里牌406号墓^[7]、杨家湾6号墓^[8]等重要墓葬。由此湖南长沙成为楚文化研究起步最早、投入最多、成效也最显著的地区。而1972年至1974年发掘的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9],则是湖南长沙地区古墓葬发掘取得的最辉煌成果。这一阶段其他历史时期的古墓葬发掘也是收获丰硕,其中最重要的墓葬有:左家塘秦墓^[10]、金盆岭西晋墓^[11]、杨家山南宋墓^[12]等。与此同时,一批重要的文化遗址被调查发现,特别重要的有望城唐代长沙窑遗址和宁乡商周炭河里遗址^[13]。

第二阶段是从1976年至1996年。在这一阶段的二十年中,长沙地区的文博机构日趋完备,考古专业人才日趋成熟。考古工作的重点还是继续配合长沙城市基本建设发掘各历史时期古墓葬,但一部分力量已延伸至县郊,一批史前文化的遗址和历史时期的城址、窑址得到了科学发掘。特别是这一时期连续三年开展的文物普查工作,摸清了家底,基本建立起长沙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丰富了长沙历史的文化内涵,为长沙市文博事业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5年,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管理组成立,开始与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配合,共同发掘长沙火车新站基建工地的古墓葬。至1980年,共清理古墓葬700余座,其中杨家山65号楚墓出土钢剑与铸铁鼎,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1980年初开始,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始相对独立地开展本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至1993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1997年更名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从长沙市博物馆分离出去,从而使田野考古和文博展览的功能更清晰,针对性更明确,这对长沙地区田野考古工作的推进和文物研究力量的增强具有积极的意义。至1996年止,共发掘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古墓葬3000余座。湘江西岸岳麓区咸家湖陡壁山曹孺墓^[14]、象鼻嘴1号墓^[15]、望城坡古坟垸“渔阳”墓^[16]等西汉长沙王室墓的发掘,为研究汉初诸侯王使用的“黄肠题凑”葬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93年望城坡西汉长沙国“渔阳”王后墓的发掘,

更是展示了长沙考古的实力,获得了丰硕成果,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殊荣在长沙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除此之外,这段时期清理发掘的重要墓葬还有金井干塘坳春秋墓^[17]、荷花池1号楚墓^[18]、五里牌战国“单渚”墓^[19]、青少年宫晋墓^[20]、德雅村晋墓^[21]、桃花仑唐墓^[22]、上大垅唐墓^[23]、洪山庙南宋墓^[24]以及张公岭战国墓群^[25]、桐梓坡西汉墓群^[26]、火把山汉墓群^[27]、谷塘东汉魏晋墓群^[28],这些墓群和墓葬的发掘,或丰富了长沙古代文明的内涵,或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这一时期长沙地区的考古工作在古代文化遗址方面有两大突破。一是从1985年开始至1987年的文物普查,这是长沙市自建国以来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市、县、郊都成立了文物普查领导小组。通过对全市四县五区247个乡镇、农场和街道所辖地域的三年的艰辛调查,共发现春秋战国以前的古文化遗址95处,古城址14处,古窑址61处,古墓群203处,古墓葬595座,古建筑71处,石刻96处(件)、近现代革命纪念遗址、纪念建筑物47处。由此掌握了情况,摸清了家底。在普查的基础上,一批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得到了科学发掘,如长沙县南托大塘遗址、长沙县广福腰塘遗址等,从而基本廓清了长沙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和编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长沙市考古工作者在浏阳永安镇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接着在市区袁家岭、南郊高桥、东郊张公岭等地均发现了旧石器,这些打制的砍砸器和尖状器均出土于第四纪网纹红土中,时代为旧石器时代的中期至早期,距今约10至20万年。这是目前所见长沙地区人类活动的最早遗物,从而填补了长沙历史的空白。二是揭开唐代长沙窑的神秘面纱。公元9世纪初刘言史《煎茶诗》中云“湘瓷泛轻花”,但“湘瓷”内涵文献记载不详。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地区发掘的唐宋墓葬中发现大量褐绿等色釉下彩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956年9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望城县铜官镇石渚瓦渣坪一带发现了烧制釉下彩瓷的“长沙窑”窑址,得到了国内陶瓷专家的高度关注。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进行复查,认为该窑址的陶瓷工艺很有特色。从此,探索长沙窑文化面貌的考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1983年3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对长沙窑进行科学发掘,共发掘760平方米,清理唐宋龙窑7座,获得各类陶瓷器5000余件。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渐创烧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釉下彩瓷工艺。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中晚唐发展到鼎盛,至五代衰落。长沙窑丰富多姿的器物造型,浑然天成的雕塑,独步一时的多色釉,独树一帜的釉下彩绘,以及集合诗书画的装饰工艺,堪称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两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历史积淀的产物,更是唐代繁荣的商品经济的成功典范。1988年国

务院公布唐代长沙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被列入国家 100 个大遗址保护的名单。这一时期的成果结集于国家社科“七五”重点研究课题《长沙窑》发表，该书至今仍为长沙窑研究的经典之作^[29]。

第三阶段是从 1996 年至今。这一时期随着长沙社会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社会的稳定和谐，文物工作愈来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社会的关注，文物政策法规深入人心，文物保护的力度加大。一批民居建筑、历史街巷、各类文物古迹得到修缮和保护，一批文化设施基地得到新建与改造，一批地方性文物法规得以颁布实施，一批博物馆、纪念馆实施文化惠民政策，向广大观众免费开放。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日趋规范。与此同时，长沙市的文博机构也更加完善与健全。市、县（市）均设立了文物局（隶属文化局），各区成立了文物管理所，乡镇（街道办）政府有文化专干（兼司文物管理工作），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由专门机构管理，或建立了群众性保护组织。2004 年，长沙市文物局的成立，标志着长沙市的文博事业更具专业性和科学性。长沙市的文博专业队伍更加成熟，专业水平日益提高，涌现出一批学者和专家，整理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和考古发掘报告。因此，这一阶段长沙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具有新的内涵和特色。一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大大加强了对古代墓葬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如荷花池^[30]、茅亭子^[31]、白泥塘^[32]、马益顺巷^[33]、三公里楚墓^[34]、风篷岭西汉王室墓^[35]、新港晋墓^[36]、园艺场南朝墓^[37]等都在这一时期被发现和清理发掘。但随着近五十年的考古发掘工作，长沙城郊的古墓葬日趋减少，且墓葬的保存完好程度较差。更主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今五一广场区域为中心的一批老城区、棚户区的改造和建设，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包括古井窖、灰坑、建筑基址、建筑构件等）暴露出来，因而成为这个阶段考古的重点对象。正是由于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遗余力的长期探寻，一批珍贵的文物和重要的遗址得以重见天日。走马楼三国吴简和走马楼西汉简牍、科文东汉简牍、东牌楼东汉简牍的发现以及坡子街南宋长沙城市大型引水木构件基址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丰硕成果。特别是 1996 年 10 月在走马楼平和堂建设工地 J22 古井窖发掘出土了 14 万余枚三国孙吴简牍，更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献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丰富的内容大大地弥补了三国史料的不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反响，被评为 199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二是文物考古工作视野更开阔，一些区县的文物队伍力量得到加强，田野工作范围更广泛。通过区县的配合，考古工作获得重大突破。望城高砂脊西周遗址及墓葬的发掘成为湘江中下游商周青铜器群研究的突破口。望城坪塘镇蚂蚁山明代长沙藩王谷王乳母张妙寿墓的发掘，展现了其庞大的规模，填补了长沙地区明代大型墓葬考古的空白。望城

星城镇风篷岭长沙王室墓的发掘，首次在湖南省发现金缕玉衣、玉圭，该墓特殊的“黄肠题凑”葬制填补了长沙地区西汉晚期长沙王室墓的考古资料的缺失。三是根据长沙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特点、基础和优势，采取国家资助，国家、省市单位联合攻关的方式开展了宁乡商周青铜器群、楚汉文化、简牍文化以及城市考古等课题的多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以宁乡黄材为中心的商周青铜器群的来源及其族属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难解之谜。这一时期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联合攻关的形式，以1996年发掘望城沱水入湘江口的高砂脊商周遗址为肇始，到2005年大规模发掘宁乡炭河里商周古城址，终于发现城墙、城壕、宫殿基址以及附属墓葬，为最终解开长沙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文明之谜获得了宝贵资料。长沙地区是楚文化分布的重要区域，目前已发现楚墓近4000座。为使楚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长沙楚墓的整理工作被列入国家社科“八五”资助的重点课题。经过省市联合课题组三年多的努力，终将长沙地区40多年来发掘的2048座楚墓资料，14000余件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整理，《长沙楚墓》于2000年出版发行。长沙国是西汉时期重要的诸侯王国，一大批王侯贵族重要墓葬的发掘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国家社科重点课题《长沙汉墓》正在整理之中。长沙窑是唐代文化的典型代表，2000年整理出版的《长沙窑》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简牍是古代文字的载体，其对中国古代文明传承、发展与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长沙地区独特的地质和埋藏条件，简牍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1996年出土于走马楼J22井窖中的14万枚三国吴简更是一次数量空前的大发现，由此上溯至仰天湖、五里牌等战国楚简、西汉简牍、东汉简牍，长沙地区整个简牍文化链条清晰，这在国内是极为罕见的。由于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和各兄弟单位、部门的支持，简牍的保护、整理与研究进展顺利，目前已整理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共五卷和《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等专著^[38]。

二

下面简要概述长沙地区各个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展相对较晚，1987年之前在全国处于落后状态。1987年4月在新晃县大桥溪的网纹红土层中首次发现旧石器，确证了湖南旧石器的存在。

至今在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共发现 200 余处旧石器地点，华南红土层的旧石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讨论。湖南旧石器除少数几处发现于洞穴遗址外，绝大部分分布在河流阶地，遗物埋葬在第四纪网纹红土中，时代从中更新世早期延续至晚更新世晚期。所见石器风格整体上表现为砾石石器工业传统，文化面貌上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时间性差异，可划分为舞水（沅水支流）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湖南旧石器具有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和典型的旧石器埋藏地层即网纹红土，在我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39]。

长沙地区的旧石器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显露出庐山真面目。1991 年 8 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浏阳永安镇芦塘村的第四纪网纹红土中采掘到 3 件打制石器，成为长沙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地点^[40]。随后，在城区五一路袁家岭、城南郊高桥、东郊张公岭等地相继发现旧石器地点，获得一批石制品。这些石器均出自湘江或浏阳河的第二级和三级阶地，埋藏在第四纪堆积物的网纹红土中。典型器类有砍砸器和尖状器，全部以河床中石英、砂岩砾石为原料，个体较大，一般长 14~17 厘米，宽 7~18 厘米，厚 6~10 厘米，重 1000~2000 克。制作技术原始简单，多利用砾石自然台面采用单面打击直接加工成形，故柄部皆保留有砾石原面。这批石器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当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晚期，距今约 20 至 10 万年。长沙地区旧石器从其原料、类型、体积、打片技术和加工方法来分析，属于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传统，极具华南旧石器文化特征，与澧水文化类群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沙旧石器的发现一方面填补了长沙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将长沙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距今 20 万年，另一方面丰富了我国华南旧石器文化的资料，因此十分重要。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经过近三十年的科学发掘，在湖南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体系。目前，学术界将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洞庭湖西北岸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湘江和资水中下游、沅水中上游、资水上游等四个区域。其中洞庭湖西北地区的工作做得最多，文化编年也最为清晰。从距今 9000 年开始直至新石器时代结束的约 5000 年时间，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相继经历了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几个阶段。至商文化的南下，致使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解体。洞庭湖西北岸的史前文化在湖南全境起着主导作用，强烈地影响着其他地区。因此，湖南大多数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经历了与其相似的几个